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 经济体制效率 分析导论

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

刘世锦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文库

# 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

——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  
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

刘世锦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  
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刘世锦著.—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文  
库）

ISBN 978-7-5432-2663-0

I. ①经… II. ①刘… III. ①国有企业-企业改革-  
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444 号

责任编辑 忻雁翔

装帧设计 王晓阳

### 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

——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

刘世锦 著

#### 出 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格致出版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3

字 数 260,000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663-0/F·958

定价：52.00 元

# 主 编 的 话

---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

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顾昕

2014年1月1日

## 再 版 前 言

---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屈指算来，2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头看一看本书曾经讨论的问题还是颇有趣味和意义的。

当时一批经历了“文革”和初期改革的青年学者，充满了对国家的使命感和学术激情。对比当下，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似乎已经不多见了。陈昕同志在上海组织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一方面引进翻译了经典的国外经济学原著，另一方面组织出版了一批国内青年学者的原创作品，颇有些“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味道。这些书籍的出版，对国外经济学新知的传播、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度研究，都起到了拓展性作用。这些年来经济读物看起来繁荣，但像这套丛书有水准、有影响力的，并不算多。

1986年，我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士学位。在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开始接触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初级的微观、宏观经济学等。大家不满意的是，中国当时尚处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状态，西方的微观、宏观经济学主要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匹配，与中国国情相去甚远。于

是，与体制改革相关的制度经济学引起了更多关注。科斯的理论流行起来，与他同属一脉的威廉姆森在北京办了个系列讲座，介绍交易费用经济学。我当时写作博士论文时，较多吸收了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思路 and 行文表达中都能看到。

在本书研究中，我首先讨论了人的行为假设和环境因素特征假设，由此引出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即激励、配置、保险、约束；在分析等级组织、市场组织和中间性组织体制效率的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的相容和组合问题，并讨论了产权结构对体制效率的影响、体制创新的条件、用耗散结构的观点分析体制长期演进等议题。

现在看来，这一分析框架还不够精致，但基本逻辑清晰且自洽，注重问题导向，对诸多现实体制问题是有解释力的。从改进和完善分析框架的角度看，也有一些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一，相对于交易成本，交易收益容易被忽略。其实，交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相互合作能够产生更大的收益，交易成本只有在与交易收益相比较的意义上才能被准确界定。不问交易收益大小，仅仅比较交易成本，实际上是无意义的。确立这样的理念，将促进人们发现或促成那些能够带来更多交易收益，或者说减去交易成本后有更多交易净收益的人类合作或交易活动，也有助于摆脱那些抽象比较某种体制组织优劣的议论，而将问题聚焦于特定的交易活动、体制组织和交易净收益相关性的分析。例如，一些年来原有工业企业内在的大量活动被外包出去，成为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因。尽管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但相对于交易收益，这类外包还是合算的。

第二，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显著加大。以往的企业产权结构中，资本是主角。随着资本不再那么稀缺，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地位上升。特别是创新性企业中，创意、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往往成为主导者，并在股权结构中加以体现。在整个生产流程中，知识的生产、流动、配置、产权保护和运用等，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要素。这种改变深刻影响到了企业的交易技术结构和相对应的体制组织形态。即使在一个等级组织中，也必须给创意者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并且设计出有足够灵活性的知识产权交易机制。

第三，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快速扩展，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密度。信息不对称是大量体制机制问题产生的源头，至少导致了两类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类是利用信息占有优势，欺骗抑或欺诈对方；另一类是无法获取交易对方足够的信息，难以做出正确决策改进资源配置。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进展，前所未有地提高了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密度。若干年前打个电话都不大容易，现在几乎每人都有手机，大量时间用在网上，这就直观地说明了信息密度的提高。信息密度的提高，有效改变了以往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诸多问题。例如，海关采用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后，骗税、走私、虚报等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行为大大减少。网上购物、网约车等的快速发展，也是以移动通信普及后信息不对称减弱为基础的。信息密度提高相应改变了交易技术结构特征和对应的体制组织形态，比如当信息密度提高后，原来需要采取纵向一体化中间性组织形态的，改为市场体制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以上说到的几个问题，只是更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对体制问题，或更广义上说制度问题的研究，需要理论本身的进步，也要应对来自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挑战。应该说，在这两方面做得都远不够好，这也说明制度变迁理论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

本书的下篇，是对上篇所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实际运用。以当时正在推行的承包制为背景，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这里简单列举其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成员追求自身利益与以集合方式共同占有财产之间的矛盾，成员集体行使权利的特定要求与这种行使方式费用过高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行政性分权最好的结果是一定时期内缓解而不可能真正解决实质性矛盾；价值形态的国有资产最适宜采取市场体制，以解决收入分配、资产流动并优化配置、风险分散以及防止诸多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产品市场的价格放开要求要素市场的相应改革和开放；传统国企体制下就业与保险职能一体化，部分国有资产具有职工社会保障职能，深化改革必须将保险职能分解到社会上去；高度专用型的劳动力可采取长期协约形式，专用型较弱或通用性的劳动力则可采用期限较短的协约形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不合理，

主要不能从个人品格找原因，而是一个典型的制度问题；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形态，必须转向股份制；政府推动的改革首先要把重点放在自身机构改革上，同时要推动法律制度改革，注重拓宽企业和个人自发性改革空间；富有活力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竞争、融合，对于推动国有经济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比照一下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问题，上述论点应该说还是有相当深度和前瞻性、针对性的。例如，由于价值形态的国有资产最适宜采用市场体制，国企改革应当由以往的管资产、管企业为主，转向以市场化方式管资本为主；传统国企内的部分资产具有为职工提供社会保障的职能，因而在改革中把部分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有逻辑依据的，等等。

经过长时间的推动和探索，国企改革至今仍处在相对滞后状态。改革的逻辑、方向以至策略应该说大体上是清楚的，但改革进程的迟缓、反复，甚至落入某种困境，确实令人深思。这或许涉及一个更大范围的体制转型问题，需要理论上更多的探索和创新，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书再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回顾、反思和深化认识的机会。再次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对本书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繁荣做出的贡献。

刘世锦

2016年8月于北京

# 序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深层矛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近十几年来,经济学界为推进改革作出了积极努力和重要贡献,但总的来说,对策性研究多一些,着眼于经济体制构造、运行和演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则相对不足,而这种不足又不能不限制对策性研究水平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刘世锦同志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应用研究》一书,就颇具特色,很有意义。

前几年,刘世锦同志作为我的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我主持的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我国经济效益的现状、问题 and 对策》的研究工作。在研究中,我们深切感到,我国经济效益不高的表面原因涉及方方面面,但归根结底是一个体制问题。简而言之,经济的低效益,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提高我国经济效益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体制变革和创新,使体制效率得到实质性的改进。这项研究工作从一个方面给刘世锦同志写作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这几年刘世锦同志注重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曾到许多地方调查承包制及其他经济问题。他还读了不少书,其中包括国外经济学的一些新进展,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从新的视角和高的起点研究体制问题做了不可缺少的理论和经验准备。

本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作者提出了关于体制问题的一些新观点和分析方法。例如,强调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对人的行为假设的依赖性以及对行为假设的描述,着眼于激励、配置、保险、约束诸方面体制效率的结构分析方法(即书中所说的 MASC 效率结构分析方法);交易技术结构与体制组织相容原理;所有制、产权结构、交易技术结构、体制组织相互关系的描述;经济体制的均衡与非均衡以及经济体制创新模型,等等。这些颇有创见的方面虽然还不成熟,还需要推敲,但它们在理论逻辑上是能站得住脚的,经过进一步努力很可能发展成一个有较高理论和实用价值的分析体系。

运用本书提出的理论框架,以承包制为典型形态,深入探讨改革时期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是本书的另一个基本内容,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和进展缓慢而成为改革的一大难点。这方面的改革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国有企业体制的构造特点和改革中遇到的问题缺乏深入认识。本书对企业改革的许多见解是有新意并给人以启发的,如关于全民所有制内在矛盾及其代理结构特征的描述,关于国有资产转让权的受限制而使收益分配、风险承担和资源配置中的矛盾无法解决的观点,关于价格放开条件下因现有企业体制缺陷而导致比价复归的观点,关于较高比例的实物福利性收入使劳动力收益权与转让权陷入冲突的观点等。应该说,目前对承包制如此全面、细致且有深度的分析还是不多见的。书中关于承包制向股份制的过渡以及相应的改革战略转换的看法,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的。

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本书体现的探索精神。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观点,或许更重要的是触及了一些对体制研究有基本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常能感到,但在理论上缺少概括,甚至缺少必要的关注。举例来说,改革初期人们比较注重解决体制中的激励和

资源配置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相对直观,以后逐步发现约束不力和风险过大等问题从其他方面影响着体制效率。人们已经意识到经济体制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功能究竟应如何分类,不同功能间以何种方式相互联系,与这些功能相对应的体制结构和效率状态如何,有关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是很不够的。本书从激励、配置、保险、约束诸方面进行的分析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当然,还不能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已经完全解决了上述问题,但重要的是系统提出、认真思考、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当前体制研究还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尤其需要提倡大胆而严谨的探索精神,以产生出更多的新思想。

刘世锦同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曾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之后他又下大功夫对论文进行了修改,使研究质量有了新的提高。这种扎实、刻苦钻研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提倡。我相信本书能够引起经济学同行和其他读者的兴趣,也希望刘世锦同志继续努力,争取取得新的、更优秀的研究成果。

汪海波

1992年7月15日

# 前 言

---

## 1

处在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对经济体制问题予以特别关注是非常自然的。这不仅因为他们已经和正在切身感受着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而且因为他们在进一步的改革中面临着种种难题。对经济体制的关注，必然要引起对描述、分析体制问题理论的兴趣和需求。然而，借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样的理论供给，尤其是能够为多种形态的体制组织的运行和演化提供一般性分析框架的理论供给，是相当短缺的。

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学术环境中引进和借鉴外来的有关理论也面临着困难。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颇为不同的是，生活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人们对经济体制问题似乎不是那么关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处在经过数百年演化而趋于稳定和成熟的体制之中。这种状况反映到西方经济学界，便是描述经济运行过程的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居于主流地位。进入这一

学派视野的主要是与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相关的变量及其关系，作为经济运行基础的制度安排则被看成是“外生”的和稳定不变的。在另一方面，研究制度安排及其演化的制度学派，虽然在不同时期曾产生过一定的、有时是重要的影响，但始终处于非主流位置。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格局也表现在它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上。经历了长时期的封闭后，人们接触最早和最多的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个变化无疑有力地刺激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革新与进步。但人们逐渐发现自己陷入某种颇为矛盾的境地：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与中国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的差别，使以前者为背景的经济运行理论难以直接解释中国的经济运行；而中国现阶段最需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则不能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吸取多少营养。与此相联系，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忽视显而易见的制度差别而简单套用西方经济运行理论（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和宏观理论）的倾向，以及经济体制运行和变革理论相对贫困的倾向。

不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某些具有深远影响，并最终可能导致一种新的经济学格局的变化。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观点和方法不尽相同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广泛的领域内，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提出了挑战，推出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成果，其中部分成果已被主流学派经济学家认同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处在危机中的主流经济学的革新。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代表性学说近些年陆续被介绍到中国。由于这些着眼于体制组织的学说较西方主流经济学更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而引起了许多经济学者的浓厚兴趣，其影响日益增加，并开始被应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即使这些适应性较强的学说在说明中国体制问题时也显露出了严重的局限。最重要的一点是，新制度经济学是以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即使是那些相当抽象的理论模型也难以不遗漏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应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的体制问题时，对原有的理论模型作某些技术性修正并不足以消除它们与中国实际状况之间的偏差。

另一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形成较大影响的理论是经济体制比较理论。严格地说，这类理论并不能被算作独立的经济学流派，它们只是已有经济

学理论在一个领域中的应用。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是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共存和竞争的格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虽然包容了某些描述经济体制构造的学说，如决策、信息、动力结构分析方法等，但大多数研究是以典型国家的对比分析为特色的。相对于这类理论所包容的丰富实际材料而言，关于经济体制的一般化理论研究，尤其是经济体制深层构造和演化逻辑的研究则是远不够充分的，因而不能不严重限制了应用这类理论分析体制问题的深刻性。尽管如此，经济体制比较理论对不同体制全面而详尽（虽然不那么深刻）的描述，对涉足经济体制研究领域的人们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中国学者关于经济体制的许多知识就是从这类理论中得到的。

中国学者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纠正了对它各种形式的扭曲后，其宏大的历史跨度，关注经济、社会制度发展和人类命运的主题，以及从具体到抽象（作为研究方法）、又从抽象到具体（作为叙述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方法，对体制问题的研究都有着巨大优势。从观察和研究问题的眼界、洞察力和逻辑性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堪称最为深刻与博大的制度经济学。另一方面，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其他一些问题时所遇到的局限性一样，这一创立于 100 多年前的学说，其经典著作中不可能包容对以后长时期内体制组织丰富多彩发展的经验总结，也不可能包容建立在新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有关体制组织的研究成果（如信息论在组织研究中的应用）。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干扰和曲折，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它对经济体制研究本来可能起到的更大的作用。

把以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包括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在内的关于经济体制组织的一般性理论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的理论背景。不过，由此而引出的并不是消极的结论。不论从社会需要还是理论准备来说，我们现在都处在发展一种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关于经济体制组织构造、运行、演化和评价的一般性理论的有利时期。当然，这样一项历史使命决不是几个人、几本书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本书对经济体制效率的研究，只可以被看成是这方面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本书研究的理论起点，下面分别回顾一下有的读者可能不甚熟悉的有关经济体制比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 一、经济体制比较理论

经济体制比较理论大致可分为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部分。就前者而言，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提出的体制研究方法是影响较大的一种。他们沿用新古典学派的方法，把决策当作分析的单元来强调，认为经济体制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决策（D）结构、信息（I）结构和动力（M）结构。这种 DIM 结构决定了决策权在一定体制参与者之间的分配，决定了他们交换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以及他们互相推动保证服从这种决策的方法<sup>①</sup>。

另一种研究经济体制的方法是从体制运行过程要素的角度来描述体制的结构和功能。这种方法把经济体制运行过程要素当作一个逻辑系列，从构成决策基础的信息开始，经过决策和决策的实施，最后出现各种各样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狭义的产品产出，也“考虑收入分配、价格变化、存货积累、失业程度、环境污染、新的发明和发现、最终的满足水平，包括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非经济方面施以影响的‘社会福利’状况”<sup>②</sup>。显然，这一方法仍以决策为基本分析单元，并把经济体制运行理解为从收集信息开始，处理和利用信息（决策及其实施），而达到某些结果这样一个信息的投入产出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过程要素分析方法是从动态角度对 DIM 结构方法的补充。

---

① 参见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9 页。

② 参见维克拉夫·霍尔索夫斯基：《经济体制分析和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24 页。

被称为“新左派”的著名瑞典经济学家阿萨·林德贝克从如下八个方面描述了经济体制的构造及其差别：（1）在经济决策上，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2）在信息传递、资源配置和协调机制上，是通过市场的还是通过行政的；（3）在财产关系上，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4）和（5）在动力机制上，个人和公司是通过经济刺激还是通过命令来推动自己的行为的；（6）和（7）在个人之间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上，是竞争性关系还是非竞争性关系；（8）在整个经济体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是开放的和国际化的还是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sup>①</sup>。

与阿萨·林德贝克同一国度的罗·艾登姆和斯·威奥第，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的一本题为《经济体制——资源是如何分配的》的著作中，选择了资源分配决策是集中化还是分散化的特定角度来观察经济体制，以此作为区分和比较各种经济体制的主要依据。他们首先抽象出完全集中和完全分散这两种处于极端的资源分配体制模式，对前者提出了要求完全的信息、要求价值观的完全一致等模式特征假设，对后者则提出了价格高度灵敏、企业规模适度 and 完全竞争等模式特征假设。然后从这两种模式出发，考察了介于其间，且有不同特征的各种现实经济体制<sup>②</sup>。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另一个重要方面推动了经济体制研究的进展。这方面的研究一般是适应比较和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需要而展开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分类。布鲁斯把决策分为三个层次，即：（a）基本的或主要的宏观决策，（b）一般的或日常的微观经济决策，（c）个人的或家庭的在劳动力分配和消费选择方面的决策。再以这三个层次的决策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为尺度，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a）、（b）、（c）均集中化；第二种模式是集权模式，（a）、（b）集中化，但（c）原则上分散化；第三种模式是含有受控制的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或“分权模

---

① 参见阿萨·林德贝克：《新左派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0—132页。

② 罗·艾登姆、斯塔芬·威奥第：《经济体制——资源是怎样分配的》，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章。